

人工智能语境下清溪客家山歌活态传承的机制重构——基于田野实践的民族音乐学分析

张荣荣

广东科技学院, 广东东莞, 中国

【摘要】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媒介语境中,传统音乐的生产与传播方式正发生结构性转变。作为岭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民间音乐形态,清溪客家山歌长期依托乡土社会与口传心授实现活态传承,但在社会结构变迁与媒介环境重构的背景下,其原有的互动空间与社会功能不断弱化,面临传承主体断层与传播场域收缩等问题。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介入,正在改变传统音乐的传播方式。随着内容生成、平台推荐和沉浸式传播的发展,清溪客家山歌逐渐突破地域限制,被更多人接触和传播。但与此同时,山歌也面临被符号化、同质化表达的风险。基于民族音乐学“音乐作为过程”的视角,并结合田野调查资料,本文从生产方式、传播结构和互动机制三个层面,分析人工智能介入清溪客家山歌传播后的变化。研究认为,技术在拓展传播空间的同时也在重塑山歌原有的传播路径。但真正重要的并不只是技术更新本身,而是在传播过程中如何继续保留山歌的文化主体性与真实的社区互动。

【关键词】人工智能;清溪客家山歌;活态传承;传播转型;民族音乐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5年度校级科研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民俗文化传播策略研究——以东莞市清溪镇客家山歌为例”(GKY-2025KYYBW-78);2025年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AI赋能高校公共艺术课程教学模式创新与实践研究”(25MY0205)等项目成果之一。

1. 人工智能语境与传统音乐传播转型

在数字技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人工智能逐渐成为影响文化生产与传播的重要媒介条件。以算法推荐、内容生成与平台化分发为代表的技术机制,使文化信息的生产与流通方式发生明显变化。^[1]与以往依赖人际关系与线下场域的传播模式不同,当代文化传播日益呈现出以数据为基础、以平台为载体的结构特征。在这一过程中,传统音乐亦被纳入新的媒介环境,其生成方式与传播逻辑随之调整,传统音乐不再仅作为既定文本被保存或展示,而是在不断被重组与再呈现中进入新的传播循环。由此,人工智能不仅改变了传播路径,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生成方式与存在形态。^[2]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清溪客家山歌在当代社会中的实践基础正逐渐削弱。田野调查发现,过去清溪客家山歌大多产生于劳作、节庆和社区聚会等日常生活场景中,人们边做事边唱歌,山歌本身也是情感交流和社区互动的一部分。但随着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变化,这类面对面的演唱场景越来越少,山歌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频率明显降低,原有的社会功能也逐渐减弱。这一变化在受众结构与传播方式上表现尤为突出。一方面,山歌参与主体呈现老龄化趋势,年轻群体接触与参与机会有限,代际传递面临

断裂风险;另一方面,山歌的呈现方式由生活化实践逐渐转向舞台化展示,其表演更多依赖组织化活动,而缺乏持续生成的日常环境,导致其即兴性与互动性被压缩。在传播层面,短视频和社交平台虽然让更多人接触到山歌,但很多内容往往以片段化方式出现,脱离了原有生活语境。人们更多是在“看山歌”,而不是参与其中。某种意义上讲,山歌的曝光度虽然提高了,但其原本依赖社区互动和现场交流的实践属性反而被逐渐削弱。^[3]

键问题不在于技术是否介入,而在于当山歌进入平台化传播结构后,其生成机制与互动关系能否得以延续。换言之,在新的媒介条件下,传统音乐是否仍能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持续生成,而非转化为被固定与展示的文化对象。在此背景下,传统音乐如何在当下智能媒介环境中继续存在和传播,值得重新思考。因此,本文以民族音乐学“音乐作为过程”的理论视角为基础,结合清溪客家山歌的田野调查材料,从生产方式、传播结构与参与机制三个层面,考察人工智能介入传统音乐传播的具体形态,进而探讨其对“活态传承”的影响。

2. 清溪客家山歌活态传承的现实困境与结构性张力

2.1 社区嵌入中的传承方式

从田野调查来看,清溪客家山歌的传承并非抽象的“口传心授”,而是嵌入具体社区互动情境之中。2025年至2026年间,研究者多次赴清溪镇开展调研,访谈省级传承人刘国权、市级传承人刘慧佳,并在山歌传承基地(清溪中、小学)及民俗活动中进行参与式观察,呈现出其当代运行方式。清溪客家山歌省级传承人刘国权在访谈中指出,山歌不是先教你怎么唱,而是要多听、多对,慢慢就会接。这一表述表明,山歌传承的核心并非旋律记忆,而是基于对话关系的即时生成能力。在实际对唱中,歌者常依据对方歌词语义与声调进行回应,形成“尾驳尾”的结构衔接,使内容在互动中不断生成。与之相比,清溪客家山歌市级传承人刘慧佳则指出,当下山歌多用于舞台与文化活动,往往需经过编排以适应固定表演结构,这反映出山歌由“情境生成”向“文本呈现”的转变,其即兴空间有所压缩。在节庆与民俗活动中,山歌仍保留一定互动性,而非正式环节中。山歌爱好者会进行即兴对唱,观众亦参与互动。有听众提到:“热闹的时候才像以前那种感觉。”表明其活态属性仍在特定情境中得以延续。

2.2 传承断层与实践场域收缩

随着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变化,原有以社区为基础的山歌传承机制正发生转型。田野调查显示,当前山歌学习者以中老年群体为主,青年参与不足,传统知识的代际延续面临不确定性。原本嵌入农事劳作与日常生活的演唱情境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以舞台表演为主的展示形式。该转变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山歌的可见性,但其生成环境由“生活场域”转向“表演场域”,音乐的互动性与情境性随之减弱。在传播层面,传统口口相传的方式难以适应当代媒介环境。尽管部分学校通过“山歌进校园”等活动推动传承,但整体仍以阶段性实践为主,缺乏长效机制。同时,新媒体平台上的山歌多以碎片化形式呈现,难以形成系统学习与传播路径。此类传播虽拓展了受众范围,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内在结构与文化语境。

2.3 代际差异中的认知张力

在具体传承过程中,不同群体对山歌发展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许多传承人更看重山歌原有的唱法和文化内涵,对过度改编或技术介入持谨慎态度,始终认为“传统味道”不能丢。而一些年轻参与者则更关注山歌如何被当代人接受,比如加入新的伴奏形式,或尝试跨界

融合,让它更贴近当代人的审美。这样的差异,其实并不只是“传统”与“创新”的对立,更反映了不同群体对于山歌价值和意义的不同理解。一方面,传统传承人更加强调山歌与地方生活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年轻群体则更倾向于在新的媒介环境中重新理解与使用这一文化资源。两者之间的张力,构成了当前山歌活态传承的重要现实情境。

3.人工智能赋能传统音乐传播的实践形态

3.1 内容生产层的再组织表达

在传统语境中,清溪客家山歌更多依赖口传心授和具体生活场景来生成。大多情况下,歌词和旋律并不是提前写好的,而是在对唱、聊天和日常交流过程中边唱边调整、边唱边发展。也正因为如此,山歌更像一种带有交流性质的“活态表达”,而不是固定不变的文本。人工智能介入之后,山歌的内容生产开始出现新的变化。生成式技术主要依赖已有语料进行分析和组合,在带来新的表达可能的同时,也改变了原本的生成方式。和传统对唱不同,AI生成的内容往往结构完整,但缺少明确的交流对象,更像是一段“写出来的话”,而不是人与人之间即时产生的互动。研究者在走访清溪镇第三小学时发现,一些参与AI创作的学生也提到,AI写出来的内容虽然通顺,但不像在“对歌”,更像是写给别人看的。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生成过程逐渐脱离具体情境,缺少面对面的互动关系;二是算法更倾向于稳定和规范的结构,即兴性和个人差异有所减弱;三是表达形式从原本不断展开的互动过程,慢慢转向完整文本的输出。因此,在实际使用中,AI更多还是作为辅助工具存在,比如帮助整理语料、提供表达思路,真正的演唱和再创造仍然依赖歌者本身。某种意义上,人工智能带来的变化,并不只是“重新创作”,而是改变了山歌原本的生成逻辑。

3.2 平台分发机制下的传播扩展

在传统社会结构中,清溪客家山歌主要通过熟人关系网络进行传播,其扩散范围与社区结构密切相关。随着媒介环境的变化,这一传播方式逐渐被平台化分发所替代。以短视频与社交媒体为代表的传播渠道,使山歌能够脱离原有地域限制,进入更为广泛的公共空间。在平台传播机制下,山歌的传播方式已经不再主要依赖熟人关系或地方社区,而更多通过算法推荐、兴趣匹配和用户行为来实现扩散。这种变化确实让清溪客家山歌获得了更高的可见度,也让不少原本不了解客家文化的人有机会

接触到山歌内容。与此同时，评论、转发、二次创作等行为，也让受众不再只是“观看者”，而逐渐参与到传播过程中。不过，传播范围扩大，并不意味着文化理解也同步加深。很多时候，山歌进入短视频或信息流之后，往往以片段化形式出现，原本完整的演唱情境、叙事结构和文化意味被不断压缩，更容易变成一种被快速浏览和消费的内容。因此，在当下的平台环境中，如何在扩大传播的同时，尽可能保留山歌原有的文化内涵，仍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3.3 媒介互动中的体验方式转变

清溪客家山歌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对唱性”。过去无论是在田间劳作，还是节庆聚会中，山歌很多时候都是在人与人的即时互动中产生的。唱的人边唱边回应，对方再接着唱，内容和情绪都会随着现场交流不断变化。也就是说，山歌的意义并不只是歌词和旋律本身，更和具体的人、场景以及交流过程密切相关。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这种原本依赖面对面交流的参与方式，也开始发生变化。在网络平台和虚拟环境中，观众不再只是单纯“听歌”的人，他们还会通过评论、模仿、翻唱甚至二次创作参与进来。有些传播实践中，还会借助虚拟形象、数字场景等方式，把山歌放进新的表演空间，让原本只能在线下发生的互动逐渐延伸到线上。当然，这种互动已经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现场对唱。它改变了参与的方式，但并没有完全消解山歌原有的互动属性。相反，在新的媒介环境中，参与不再受限于固定时间和空间，而变得更加分散、持续。某种程度上，山歌也从过去一次性的现场实践，慢慢转向一种能够被不断触发和重新参与的传播过程，其原有的社会联系与互动功能，也因此在新的语境中得到延续。

4. 清溪客家山歌活态传承机制建构

4.1 人机协同生成机制与即兴性的延展路径

在传统语境中，清溪客家山歌更多依赖歌者之间的即时互动来完成。很多内容不是提前设计好的，而是在“你一句、我一句”的对唱过程中自然生成。它本质上更接近一种交流性的表达，而不是固定文本。但人工智能介入之后，这种生成方式开始发生变化。AI 主要依靠已有语料和算法进行组合生成，虽然能够快速形成完整内容，但和传统对唱相比，缺少了具体情境中的即时回应。田野调查中，就有参与者提到，AI 生成的内容“更像写出来的，不像对出来的”，其实已经反映出两者在生成

逻辑上的差异。因此，问题的关键可能并不在于“要不要使用 AI”，而是如何让人的参与继续保留在生成过程中。借鉴 Timothy Rice“音乐作为过程”的观点，山歌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形成一个固定作品，而是在不断互动中持续生成。基于这一点，可以尝试建立一种“人机协同”的方式：由 AI 提供关键词、语义方向或节奏框架，再由歌者根据具体场景进行即兴调整和现场回应。比如通过“关键词触发—现场对唱—即时修改”的方式展开，让 AI 更多扮演辅助和触发的角色，而不是直接替代歌者完成创作。这样既能保留山歌原有的即兴性，也让它在新的媒介环境中继续发展。

4.2 情境再嵌入机制与活态属性的空间重建

清溪客家山歌长期以来都依赖具体生活场景来生成，比如农事劳作、节庆活动和社区交往等。这些场景不仅是演唱空间，本身也是山歌意义形成的重要部分。但田野调查发现，随着舞台化和平台化传播的发展，山歌越来越多地以“表演”形式出现，原有的互动关系和生活情境被不断压缩。从民族音乐学角度来看，Alan Merriam 提出的“声音—行为—观念”结构强调，音乐的意义往往建立在具体实践情境之中。当山歌脱离原有生活环境后，它所承载的文化意味也会随之减弱。因此，在人工智能和数字传播背景下，更重要的可能是如何重新建立山歌与情境之间的联系。比如，在传播过程中保留对唱和互动的过程，而不仅仅呈现最终结果；增加节庆、社区等具体背景信息；或通过连续性的内容记录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这样做并不是简单“还原传统”，而是在新的媒介环境中，重新让山歌拥有可以被感知的生活语境。

4.3 参与式传播机制与互动关系的重构路径

在传统传播结构中，山歌的传承依赖社区内部的参与关系，歌者与听众之间具有高度互动性。而在平台传播环境中，山歌更多以“被观看”的形式存在，受众虽规模扩大，但参与深度明显降低。田野观察亦表明，只有在非正式互动场景中，山歌才呈现出较为接近传统的活态状态。从文化研究视角来看，Stuart Hall 指出“文化意义是在不断互动与再生产中形成的”。^[6]当传播关系由参与转向观看时，其文化生成机制亦随之弱化。因此，有必要构建“参与式传播机制”，使受众重新进入生成过程。在具体路径上，可通过平台互动功能实现，如鼓励用户参与对唱、开展改编与接唱实践，以及增强传承人与受众之间的即时交流。通过这

一机制,传播过程由单向展示转向多向互动,使山歌在新的媒介结构中重新具备“生成性”,从而维持其活态传承的基本特征。^[7]

5. 结语

在人工智能越来越深度参与文化生产和传播的背景下,清溪客家山歌面临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怎么传承”,更重要的是,它原本的生成和传播方式正在发生变化。本文结合民族音乐学“音乐作为过程”的视角,以及田野调查资料,从内容生产、传播结构和互动关系三个层面,分析了人工智能介入后对山歌活态性的影响。研究发现, AI 虽然扩大了山歌的传播范围,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原有的即兴性和互动性。传统山歌更多是在人与人的交流中生成,而 AI 生成则更偏向结构化和文本化表达,两者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基于此,文章提出“人机协同”“情境再嵌入”和“参与式传播”等思路,希望在技术介入过程中,重新建立人与情境之间的联系。归根结底,传统音乐真正能够延续下去,依靠的并不是形式上的保留,而是其生成逻辑能够在新的传播环境中继续运作。

参考文献

- [1]贾菁.人工智能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的进阶路向[J].当代传播,2020(1): 98-101 页.
- [2]马毅.数字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J].大众文艺,2019(24): 3-4 页.
- [3]李雁.新媒体时代客家山歌音乐文化传播路径研究——评《客家山歌的当代传播与研究》[J].新闻爱好者,2018(4): 38 页.
- [4]Timothy Rice. Toward the Remodeling of Ethnomusicology[J]. Ethnomusicology, 1987, pp: 469 - 488 页.
- [5]Alan P. Merriam. 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M].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4.
- [6]Hall Stuart.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J. Rutherford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0, pp: 222 - 237 页.
- [7]李伟、林乔苑.虚拟现实技术赋能客家音乐传承与创新的实践研究——以客家民间音乐 VR 作品为例[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24(3): 117-128 页.